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东、华北地区相继沦陷,大批文艺界人士被迫撤离,围绕武汉形成了一个集中的文艺圈子。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文艺活动。为提高文艺宣传工作的战斗力,根据中国国情和抗战需要,中共中央针对抗战文艺的特点提出了指导与建议:“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文艺承担起重要的动员和呼唤功能,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也都放下了手头的创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选择适合于广泛宣传的艺术形式,以文艺配合抗战宣传。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文艺工作者,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老舍面谈,代表党中央指示由老舍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1938年3月27日,“文协”在汉口成立,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中呼吁:“我们的工作商讨而更切实的到民间与战地去,给民众以激发,给战士以鼓励。”当天,《新华日报》刊发题名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的社论,发出同样的号召:“发动文艺家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所谓‘作家式’的生活已经不该而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文协”成立后,先后举办通俗文艺讲习会、通俗文艺座谈会,发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号召作家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得到了文艺界的积极响应。

在“文协”组建之初,老舍先后发表了《写家们联合起来》《事情要大家做》《我们携起手来》等一系列文章,呼吁作家们团结互助,抗日救国。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一文中,老舍谈到这一口号对抗战时期的创作提出了两个要求,其一是要创作出特色鲜明的民族文艺,其二是抗战文学要广泛动员群众。前者是从内容上要求抗战文学用民间的语言和民间的材料创作民间的故事,后者是从形式上要求利用民间固有的鼓词、旧小说等进行创作。

老舍抗战期间的鼓词创作正是在这样“旧瓶装新酒”的理念之下进行的。市民出身的老舍对通俗文艺有天然的亲近感,在济南任教时,由于抗战时局的紧张,他就想到用民间文艺宣传抗战,曾拜访京韵大鼓的代表人物,与他们讨论鼓书的做法。到武汉后,他进一步推进鼓词创作实践,向鼓词艺人学唱鼓词,在写作和演唱的结合中努力把握鼓词的规律。老舍现存的抗战鼓词作品有《张忠定计》《游击战》《王小赶驴》《二期抗战》《文盲自叹》《新“拴娃娃”》《陪都赞》《赞国花》《贺新约》等篇目。这些作品明确地以广大百姓和士兵作为目标受众群体,内容明白浅近、通俗易懂,形式上注重对称押韵,朗朗上口,便于演唱。

老舍的抗战鼓词主要包括揭露日军暴行、呼吁民众抗战、赞颂抗战实绩、提倡文明生活等几大主题。他在多篇鼓词中揭露日寇奸淫烧杀的罪恶行径,强调“日本并非专打我们的军队,也杀我们百姓”,以日军的凶残和百姓的惨状激发民众反抗侵略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如《游击战》控诉了日寇的“三光政策”:“我们的铁道他占去,专运军火与大队。我们的货物他拉走,明夺硬抢不留情”“我们的妇女他霸占,奸淫完了再杀生。来时大炮轰天响,临走烧房杀壮丁”。老舍基于战时的报道和见闻,以大量的细节性描写揭露日寇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行径。在揭露日军暴行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呼吁民众奋起反抗,投身抗战,保家卫国。他充分利用鼓词说唱表演的特点,以“说书人”的身份自居,采用自问自答、欲扬先抑、正反对比、层层深入等多种方式,诙谐幽默,引人入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民众论述全民参与抗战的重要意义。如《游击战》动员百姓摒弃传统的“好男不

国家话语与民间文艺的结合

——老舍的抗战鼓词创作实践

□吴纪阳

老舍在抗战时期的鼓词创作实践折射出一代文艺工作者“以笔代枪”投身救亡事业的热情。以他为代表的抗战通俗文艺重拾了五四新文学之外的传统文学与民间文学形式,将抗战的宏大叙事与民众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将大众娱乐和宣传抗战的现实命题整合起来,让通俗文艺在抗战时期承载了它以往所少有的功效,反映出纯文学和通俗文艺之间的有效联结



当兵”想法,积极参军入伍:

“什么叫作游击战,就是人人处处动奇兵。明公也许发疑问,这个法子哪能行?岂不闻奸人不把兵来作,好铁还不去打钉,我们良善老百姓,怎肯投入军大营……可是这乃老年间的话,到了而今不时兴。请看小小日本鬼,为何枪多兵又精。只因全国都入伍,天天操演出征……回头再把咱们看,重文轻武爱书生。有朝一日敌人到,我们低头降了城,受了欺负不敢语,家破财空活不成。空是男儿七尺汉,不言不语暗伤情。作了奴隶真好苦,子孙万代少前程。为国为己都当战,人人奋勇把敌迎。”

老舍的鼓词也赞颂全民抗战取得的战绩以及其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以此鼓舞人心,动员军民坚定必胜信念,坚持持久抗战。《二期抗战》记叙了潼关、临沂、济宁之战:在潼关“我军渡过黄河去,抄敌后路各争先,一天杀死敌五百,两天就死整一千”;在临沂“张虎二将齐下手,一阵杀敌五六千”;在济宁“我军奇勇虎一般,四面包围把敌困”。《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是两篇典型的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叙事的作品,分别描写了王小、张忠两位乡民投身抗战的故事。老舍刻画了以赶驴为生的王小形象:“王小为人最和气,笑容满面起红光。见着熟人忙问好,见着生人叫老乡。不和同行抢生意,不和主顾争短长。”这样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乡民,在抗战救亡的局势下,却能够认识到“为国一死心无恨,强似为奴把国亡”,从而慷慨投军,牺牲战场。张忠则是“宽眉大眼鼻端正,虎臂熊腰性似刚”,过着安居乐业的农家生活,“世人不晓田家乐,一家四口乐安康。住的本是乡间里,一年到底做活忙”。当日本侵略军逼近家乡,张忠决意参军保卫家园,在与妻子告别时说:“杀他一个够了本,杀死三个赚一双。”“我若不归丧了命,烧张纸来哭一场。儿女长大若问爸,就说为国阵上亡。”这样的形象塑造策略有效消解了普通民众与抗战英雄之间的心理距离,揭示出民族危亡之际社会各阶层共同具备的卫国担当意识,从而成功激发了大众基于乡土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感。

老舍的抗战鼓词不仅聚焦于抗战实践,还关注作为抗战背景的社会文化改造,宣传新思想。《新“拴娃娃”》对传统滑稽鼓词求神赐子的《拴娃娃》进行了创造性重构,讲述了“新女性”刘三姐与丈夫约法三章,强调婚后女性的平等地位与行动自由。在抗战背景下,夫妇共同决定去收容所领养一个难童,将他培养成报仇雪耻的小英雄,实现了从“多子多福”的民间传统到“培育革命后代”的新型家庭观念的范式转换。《文盲自叹》以诙谐的口吻讲述文盲王老呆在娶妻、做生意等方面皆不顺利的故事,将他的挫败归结为没有受过教育,进而引申到“王老呆自叹受的本是文盲害,愿我国推行民众教育造就人才”。

在艺术效果上,老舍的抗战鼓词延续了大鼓词通俗有趣的传统,并具有京韵大鼓的雅俗共赏、刚柔并济的风格。他创作的鼓词被多位民间艺人演唱,收到良好的演出效果,对宣传抗战、鼓舞民心起到重要的动员作用。

老舍曾在《八方风雨》中谈及自己战时的生活与创作:“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老舍的创作实践折射出一代文艺工作者“以笔代枪”、投身救亡事业的热情。以他为代表的抗战通俗文艺重拾了五四新文学之外的传统文学与民间文学形式,将抗战的宏大叙事与民众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将大众娱乐和宣传抗战的现实命题整合起来,让通俗文艺在抗战时期承载了它以往所少有的功效,反映出纯文学和通俗文艺之间的有效联结,真正推动文学从“象牙塔”走向人民大众。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仍在持续的“民族形式”探索和“人民文艺”建构、传统文艺形式的现代转化探索,乃至新时代以来新大众文艺的创新与发展而言,老舍的抗战文艺实践都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5月以来,许多成熟作家携新作重返创作现场,青年写作者亦以锐利的笔触介入现实。在技术浪潮试图重塑人类感知方式的今天,这些新作以其独有的细腻与执着,构筑起兼具现实温度与思想深度的精神家园。

丈量自然的维度

在文学写作中,自然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人文精神的深厚土壤。作家们的书写,让“人与自然”这一文学母题在当下生长出更为丰饶的精神向度。《当代》2025年第3期推出毕淑敏的长篇新作《昆仑约定》。小说讲述了成边战士们在“世界第三极”的酷寒中与自然角力,在生存困境里磨砺出信仰之光。

乡村是人与自然密切互动的场域。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乡村面貌发生的深刻变迁成为当下文学写作的重要题材。《中国作家》2025年第6期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栏目刊发了关仁山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滹沱河上》。小说以常山战鼓传承人的命运为线索,展现非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现代转化。王妹英的长篇小说《豆谷记》(《中国作家》2025年第5期)以百年村落为舞台,书写主人公从战乱孤儿到企业家的蜕变经历,可作为中国乡村精神演进的微观标本。

有作家通过虚构或非虚构的形式,审视自然与心灵、社会的复杂关联。龙仁青的中篇小说《与羚同名》(《人民文学》2025年第6期)以动物保护为主题,折射现代性冲击下的情感疏离。王曦的中篇小说《塌陷区》(《北京文学》2025年第6期)聚焦妖魔山煤矿的倒闭,揭示破坏自然的后果。荆歌的短篇小说《金子》(《当代》2025年第3期)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主人公与狐狸相伴,将孤独熬成了与自然对话的秘语。安宁的散文《道路迷失的森林》(《中国作家》2025年第5期)书写人与动物的生存状态,传递了对生命与自然的思考。

援外者的足迹既丈量着地理的距离,更在异域的山川水土间,书写着文明对话的篇章。《人民文学》2025年第5期刊发的赵大河的中篇小说《大有》与别鸣的短篇小说《流水行云》均讲述了技术人员援外的故事。《大有》以农业专家在外遇袭失踪的悬疑架构,勾勒出中国技术援外的一个侧影;《流水行云》将斯里兰卡水电站的建设现场与三峡工地的记忆相互交织,展现水利人的精神传承。

激活记忆的表达

在《中国作家》2025年第5、6期的“王蒙聊《聊斋》”专栏中,王蒙对《崂山道士》和《喷水》的点评以独到的视角、幽默而深刻的语言,引领读者领略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魅力。如何激活先辈们留下的文化记忆,从中持续挖掘新的内涵,是当下数字时代进行文化探秘的重要面向。

城市经验的变迁承载着时代的集体与个体记忆,是作家们着力深耕的主题。杨志军的中篇小说《卓玛日记》(《当代》2025年第3期)写草原少女进城创制“酥油咖啡”,饮食融合的背后是新一代牧民在传统与现代间的精神成长。同期还刊发了肖复兴的散文《老街五记》和班宇的中篇小说《白象》,两部作品皆以城市变迁为背景:前者以小见大,从同泰店的兴衰落笔,勾勒出北京城市面貌的更迭脉络;后者则在代际恩怨的缠绕中,展现特定历史时期普通人的命运沉浮。

在书写城市记忆时,作家们往往以童年记忆映射出时代变迁与个体经验。《北京文学》2025年第6期的“新北京作家群”栏目中,宁肯的中篇小说《鸟》用童年的记忆碎片,串联起20世纪北京胡同里的生活印记。同期还刊发了徐皓峰的《香港武人记》,以1953年的香港为背景,刻画彼时武人的江湖恩怨与生存挣扎。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引发热议的素人作家以扎根生活现场的独特视角,真切地刻录下普通人的生命记忆。《北京文学》2025年第5、6期分别发表了两位素人作家的非虚构作品,王计兵的《父母爱情》和范雨素的《丁丁长大了会开飞机吗》,反映了普通劳动者们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起伏。第5期还刊发了皮村文学小组的“劳动者文学杯诗歌精选”,这些诗作展现了煤矿工、护士等不同劳动者的工作场景,诗行间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命运的思考。

开掘情感的深度

都市生活里的矛盾、不安与挑战都是当下写作的重要主题,本期扫描的新作对此进行了多面向的探索。朱秀海的中篇小说《接近于无限透明的演奏》(《北京文学》2025年第5期)通过小提琴家的资助往事、女儿的艺术抉择,探讨艺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聚焦养老问题的还有马金莲的中篇小说《小白狗的故事》(《人民文学》2025年第6期),借宠物狗的际遇,折射出老人照料难题及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在当代都市语境中,女性面临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具体而微地体现在婚姻、情感、育儿等生活命题之中。作家们以具有性别意识的笔触,对这些命题进行深刻的书写与剖析。程黛眉的短篇小说《牡丹亭》(《人民文学》2025年第5期)描绘了中年女性在婚姻围城里的迷失。《青年文学》2025年第6期的“玫瑰空间”栏目中,包慧怡的短篇小说《明日烟花》以乳腺检查为引线,呈现亲密关系的复杂性及女性自我价值的探寻。

在AI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文学以独特的具身经验与个体记忆,彰显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守护着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类主体性。那些被书写的昆仑风雪、滹沱河鼓声、都市霓虹下的身影,都是人类在技术狂飙中对自身存在的确认。期待作家们继续寻找独一无二的表达,让文学成为抵御同质化的坚固堡垒,守护人类精神世界的温度与诗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硕士生)

《人民文学》《当代》《北京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

守护精神世界的温度与诗意

□万小川

■新作快评

郑欣长篇小说《山那边是云》,《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3期

山与云之间,是无数女性正在走的路

□刘 皓

贵州作家郑欣的长篇小说《山那边是云》以三个女性形象搭建起当代知识女性的精神沙盘,作品表面上讲述的是三个女人的命运交织,实则揭示了现代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生存辩证法。黄小小、素瓦、陈洛迪各自的命运轨迹,组成了一个关于女性自我实现的复杂方程式,恰如女性面对现代困境时的三种回应方式——挣扎的妥协者、沉默的抵抗者与超然的解构者。

“俗人”黄小小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俗人哲学”,她身上凝聚着当代年轻知识女性的普遍特质:一方面渴望保持精神独立,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现实利益。这种状态反映出部分知识女性的困境:她们掌握知识技能,却尚未获得相应的精神自主性。黄小小对陈洛迪的仰慕,本质上是对另一种可能自我的迷恋,这使她永远活在别人的影子下,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认同。这种“拧巴”的生存状态,正是当代部分知识女性的精神缩影。

“素人”素瓦代表了另一种生存智慧。素瓦在丈夫车祸去世后,以惊人的韧性在异国他乡独自抚养孩子。与黄小小不同,素瓦的抵抗是沉默而务实的,她不纠结于身份认同的焦虑,遵循简单而有力的生存哲学:活下去,让孩子活下去。素瓦的坚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圣母式牺牲”,而是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智慧选择。当黄小小在职场中为升职加薪而焦虑时,素瓦关心的是明天的面包在哪里;当陈洛迪在国际舞台上挥洒自如时,素瓦在餐馆后厨默默洗碗。郑欣通过这个角色引导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在讨论女性解放时,我们是否常常忽

略了那些在基层艰难生活的普通女性?

“实人”陈洛迪是完美现代女性的化身。她理智、通透、游刃有余,似乎已经破译了女性生存的密码。这个“实人”形象满足了社会对成功女性的想象:专业能力出众、人际关系娴熟、情感收放自如。郑欣并未将陈洛迪塑造成女性成长的标准答案。小说通过黄小小无法成为陈洛迪的焦虑,暗示这种完美形象的不可复制性。

侗族大歌是小说的暗线,巧妙串联起三个女性的命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既不是被供奉的博物馆展品,也不是被商业化的地方符号,而是如同“曲水流觞中伴着酒具游走的花瓣”,自然而然地融入人物生活。三个女性对侗族大歌的不同态度,折射出她们与传统的关系:黄小小将其视为文化资本,素瓦将其视为乡愁载体,陈洛迪则将其视为跨文化沟通的媒介。郑欣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探讨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文化能否为现代女性提供精神资源?

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大多面目模糊,并非作者笔力不逮,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黄小小的无名男友是“打发时间的工具”,素瓦的丈夫已离世,陈洛迪的情感生活更是讳莫如深,这种写法让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女性自身的生存状态上。郑欣似乎在说:女性的问题必须由女性自己来面对。这使得《山那边是云》超越了传统性别叙事的框架,进入了更为深刻的维度。

小说中郑欣的语言风格呈现出“欧化”和“本土性”相结合的特点。她留学法国的经历,使文本描写人物心

理时细腻绵密,让读者能共情入心;在处理贵州本土经验时,语言又变得质朴有力。这种语言的双重性表现出当代知识女性的文化认同,她们的思维已经全球化,身体却仍扎根于特定的土地。小说中关于多瑙河与塞纳河的描写并不是简单的异国情调展示,而是为了构建一种比较的文化视野,在这种视野中,侗族大歌获得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山那边是云》的结尾是开放的,三个女性都找到了暂时的平衡,但她们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决。这体现了郑欣对女性成长的理解——不是一场有明确终点的赛跑,而是一次无尽的跋涉。

山与云的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构成一个精妙的隐喻系统:对黄小小而言,山是现实的重量,云是缥缈的理想;对素瓦而言,山是生活的艰辛,云是远方的希望;对陈洛迪而言,山是职业的高峰,云是精神的自由。每个人都在这两极之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山与云之间,是无数女性正在走的路。郑欣用她敏锐的观察和富有诗意的笔触,为我们记录下了这条路上的汗水、泪水与偶尔闪现的星光。当代女性文学谱系中,《山那边是云》的独特贡献在于展现了女性处境的复杂性,压力不仅来自外部社会,也来自女性内部分化与挣扎。通过三个女性的故事,郑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女性的自由不在于成为谁,而在于有权利不成为任何人的预设。女性的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每个答案都必须自我创造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联部会员处处长)